

深化国际合作 推进绿色转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6年年会主题论坛综述

编者按

12月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16年年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年会主题为“生态文明:中国与世界”。会议设立绿色转型新动能与可持续发展未来、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分享经济与绿色发展、南南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等4个主题论坛。本报今日刊发相关论坛综述,以飨读者。

生态环保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引擎和推动力

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以及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如何落实好这些承诺是中国政府当前一个重要议题。在正在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6年年会主题论坛“南南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上,参会代表认为,“南南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对于世界和中国都意义重大。在南南合作中,要增加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深化发展的新路径,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把中国成就转变为世界机遇。同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化实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与沿线国家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生态文明南南合作协调机制”

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近年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展国际合作,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的多边过程,不断拓展和深化双边和地区合作,发起了包括“一带一路”、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项合作倡议,为推动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多平台和发展理念。

正如环境保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所言:“中国现在正在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的升级版,为全球的绿色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主要目标。”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南南合作由各部委、地方政府等根据各自需求开展,相互之间缺乏总体协调和部署,没有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部署,做出顶层设计和规划,对于南南合作各种形式、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也没有统一的考虑和协调,因此不能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对此,周国梅建议加强部级方面的协调,组建独立的发展合作管理机构,统筹整合南南合作工作。

在讨论中,与会专家建议,建立更高级别协调机制,将生态文明推广到中国各项南南合作计划和行动中,形成围绕制定生态文明南南合作战略、政策以及重大合作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协商商制度。同时,在这一机制下建立“生态文明南南合作国际专家咨询工作组”。

生态环保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引擎和驱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注重绿色化。对此,国合会委员、印度尼西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创始人、印度尼西亚区域发展与人居部前部长薇特欧拉认为,南南合作各方不能仅把合作看成是一种资源合作,而且应该追求共赢。

对此,国合会委员、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秘书长李德薇指出,要用一种更加合适的方式来促进全球发展。在荷兰,关于如何建设更加生态、环保的发展项目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要对这些投资进行战略评估,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效。任何基础设施的规划都要从一开始就进行战略评估,战略评估需要很多讨论,但是这样做非常值得。

加强资金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虽然近年来对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投入逐步增加,但项目数量和资金额所占比重依然较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南南合作遵循项目由受援国提出的原则。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项目不能进入优先名单,而中国各部委和其他相关方面的丰富资源和项目推介也难以参与进来。

“要能够使得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来,因为他们起到的作用会非常大。不仅在我们国家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要能够把这一点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联系起来。”李德薇说。

目前,中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南南合作依然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而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的参与度较低。一方面,因为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资金支持以调动地方政府及其他社会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亦缺少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对外开展合作的经验和能力。

应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的提升过程。近年来,关于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国际研究表明,环境、减排和其他社会目标之间互相影响和支持,并且从关注特定发展目标转向注重更为系统的整体发展目标。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考虑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保护要求,并对社区的传统生计和新经济模式尝试提供支持。

国际竹藤组织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总部设立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认为,保护环境、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的竹编产业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竹藤组织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能够使得南南合作下的不同国家在绿色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好竹藤。比如,在菲律宾就有约25%的学校建筑实际上是用竹藤来建造的。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竹藤的作用。中国在竹子和竹藤的应用上无论是技术还是创新都是在全世界领先。可以通过加大南南合作国家竹藤产业发展,吸引竹藤产业投资、竹藤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源培训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以上稿件由本报记者郭薇、刘晓星、童克难、邢飞龙、吕望舒撰写。

以绿色转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在经历了工业时代“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损耗、高碳排放”带来的种种环境危机后,人们的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绿色发展日渐成为主流的发展观,如何实现绿色转型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身份转变,中国如何成功转型,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中国未来的绿色转型,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内容和模式即将来临,也意味着发展理念的深刻改变。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在“绿色转型新动能与可持续发展未来”主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与各国相关机构的代表就转型后的绿色经济、如何实现转型目标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讨。

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调整要坚持绿色转型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据统计,2016年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2%,等于提前实现了3.4%的全年目标,单位GDP碳排放下降了6%,大幅度实现全年下降3.9%的约束性指标,4项主要污染物都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也会超额完成全年的约束性指标。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在“十

三五”规划提出的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生态效益的目标。

“目前我国已经经过了第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为我们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恢复生态环境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国合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服务业为主的时代,整个服务业占社会经济比重的53%,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服务业的增长,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压力会逐渐减少。”胡鞍钢说。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中国过去传统的高资源消耗模式下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按照常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从高速到中高速转轨的阶段,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而在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罗夫看来,绿色能源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要发展成为低碳经济体,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将非常关键。“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它对整个亚太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公众消费观也要绿色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绿色

的需求也在显著上升。“现在大家已经愿意为这种需求来付费,这就是消费绿色化的趋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会上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互联网服务给人们的生活都带来了便捷,但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带来的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和高碳排放的问题。

“我们现在叫的外卖每天产生的垃圾能够铺满59个足球场。”在国合会2016年年会主题论坛上,来自巴黎政治学院的杨丽这样说道。据她介绍,目前中国每天有800万个外卖订单,产生的食物残余达到了350吨/日,达到了一个中大型厨余垃圾处理厂的日处理水平。

这种情况所引发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公众所熟悉的就是因焚烧不彻底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但会给政府带来高额的处理成本,也会让民众对垃圾焚烧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杨丽说。

目前对于厨余垃圾的处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还没有针对外卖垃圾这一包含厨余垃圾与可回收利用资源重合的领域进行处理的体系。当前更常见的则是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处理。杨丽的课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外卖废弃物纳入资源化循环利用的渠道。

“这个方案不仅能向公众普及关于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的知识,也能带动更多的消

建立合作机制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和海洋、极地的保护问题,是代表和专家学者讨论的话题之一。

要对《巴黎协定》落实充满信心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对于这种情况,国际社会也表现出了担忧。

《巴黎协定》生效后能否得到很好的落实?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介绍了日前召开的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情况。作为《巴黎协定》生效后的首次缔约方会议,马拉喀什大会通过了气候行动宣言。“通过宣言可以看出,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实行绿色低碳增长方面是有信心的,这也表明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解振华表示,宣言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增长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解振华介绍,为落实《巴黎协定》,此次安排还就一些实施细则和措施作出了具体安排,明确了各国的工作任务。

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各国专家也就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环保协会执行副总裁雷佳斯介绍,目前加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制定了减税40%的激励措施。也有很多国家在《巴黎协定》之后采取了大量的应对措施。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

德尔贝克同样认为应该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表示肯定。“《巴黎协定》之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也有些国家还需要继续努力。”德尔贝克说。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总裁魏仲加说,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和企业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日本、韩国以及加拿大等地都出台了包括碳价、绿色建筑等一系列新的方法和措施。“事实上,2050年并不遥远,比如德国已经制定了2050年全部取消煤炭使用的计划。应对气候变化,要进行政策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于政策的执行能力。”魏仲加表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国际机构计算,从2015年到2030年的未来15年间,与2000年到2015年过去的15年比较,能源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体相当。但是未来15年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可能会从过去15年的年均2%左右下降到1%左右。

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每年下降的速度由原来的每年1%左右变为2%左右。尽管这样的速度与过去15年相比已经增加近一倍,但这仍然不能实现本世纪内气温上升控制在2°C的目标。国合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任何建坤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全球应该超过每年4%。

“要真正实现《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需要各国发挥自己的领导力。中国显然是

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国家。过去几年中,中国已经变成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雇主。”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对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正如兰博蒂尼所言,过去几年,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何建坤介绍,为实现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中国将指标分解到了3个五年计划当中。同时,中国还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不超过50亿吨。此外,“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5%。

“总量的控制就是天花板,这几个目标实际上就提出了中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何建坤说。

何建坤介绍,在碳减排方面,中国还开展了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将目标分解到每个省、市。“十三五”期间,更是特别鼓励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能够各自制定更为先进和更为有雄心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一些地方制订的减排目标比全国碳排放峰值目标提前10年左右,在全国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此外,中国将在明年启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用市场手段推进企业的减排。

海洋与极地环境保护应受到重视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海洋和极地保护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地球边界是环境

费者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杨丽还表示,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课题来解决绿色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绿色供应链部分,利用“逆向物流”来实现外卖供应链的绿色化。

以国际合作推动绿色转型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机制体制和多边、双边协定积极应对生态环境挑战。通过一系列公约与协定的签署,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举的概念广为接受,更开启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与对话共同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进程。

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有数据表明,中国现在仅在绿色能源方面所创造的就业数就已占世界总量的40%。但《巴黎协定》的签署表明,世界各国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还需各方合作。而中国在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与许多国家的战略进行经贸对接,在这个过程中也贯穿着环保合作。“我们在转移产业过程中,要本着绿色‘一带一路’的原则,加强环保合作与互动。”国合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李晓西说。

“如果我们找到新的绿色发展新动能的话,中国就能够和全世界一道在生态文明方面寻找到一条新的建设道路。”一位国合会观察员在会上说:“过去是中国向世界学习,现在是世界和中国之间相互学习,这也是国合会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

中人类活动的极限,一旦打破就可能引发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降低地球的宜居程度。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和极地的保护边界,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积极意义。

国合会委员、挪威极地研究所所长温特表示,海洋的过度开发和污染,将影响人类更好地利用其实现经济增长。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各国要达成共识,共同面对海洋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问题。目前,很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组织已经开始关注海洋问题,并针对其进行了深入讨论。

“长久以来,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倾向于内陆水系,现在中国也需要参与到全球的海洋环境治理问题的队伍当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建议。

事实上,中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开始重视海洋经济,‘十三五’规划也对蓝色经济予以强调。”温特说,中国已经在国际海洋以及海洋合作中扮演着重角色,中国会继续关注极地区域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包括气候、农业还有相关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所以需要考虑到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及能力来参与全球的海洋议题的讨论。下一步,建议设立工作组,全面诊断并观察海洋环境面临的问题。其中应该包括目前全球的倡议、措施,从国合会角度采取措施对这些国际倡议进行补充。

“我们必须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来管理海洋资源和极地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陆地之间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之间的作用。”国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表示。他坦言,在这方面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目前来看过程还很难,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制定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规划,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彼此学习。

速度非常快,去年一年,腾讯和阿里巴巴集团就通过让用户采取移动支付的方式,使得银行支付的收费降低了200亿元人民币。

SOHO中国总裁闫岩介绍了分享经济和绿色经济在办公楼建筑中的应用。SOHO中国在建设一栋50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时,通过互联网在所有建筑里面放入了上万个传感器。通过互联网把所有楼宇中每一个设备的用电情况,每一个房间的温度、湿度等信息通过互联网传回到节能中心,通过节能中心控制所有设备的开工速度用量,使得楼宇的能源消耗得到大幅度的降低。同时,SOHO中国推出了SOHO3Q,即空间共享的办公形式。在办公中共用分享空间、会议室、打印机等,人均可节约一半的办公面积。1997年至2014年,中国一共新建办公楼5.2亿平方米,如果把其中10%的面积变成共享办公,意味着不用再盖新的办公楼,通过增加旧办公楼的使用率,在现有的办公楼里面承载更多的人。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在不增加新的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能够满足现有和未来增长的使用需求,达到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在最后的发言中指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环境保护也需要思考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建立协同共治的大保思维。支撑这种生态文明的革命就需要达成共享的共识,建立这种共识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思维和治理行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应该围绕新型的分享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思考中国如何跟进,如何给它更多的营养,让它健康发展。